

青年人才发展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4.011

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 空间困境及主体行动



郝薇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面临多重阻力。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为理解个体学术职业发展的现实境遇提供了一个结构性分析框架。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日常学术生活在实践的空间、空间的表象和表征的空间三重空间中流转,三者共同组成了空间关系场景。在实践的空间上,从一而终的高度组织依附关系逐步转向“委托—代理”式学术契约关系,组织空间的“单位制”属性剥落,“单位人”身份形态受到冲击。在空间的表象上,学术管理主义设定的强控制性空间构想被个体合理内化为内卷式学术劳动,导致“经济人”身份发生偏轨。在表征的空间上,任务导向的实践体验覆盖了结构松散的学术空间,个体的主体性被行政管理的精细安排遮蔽,逐渐弱化与他者的交往,陷入“社会人”身份的彷徨。聚焦个体行动,出于生存需求,高校青年教师不同程度地卷入达标竞赛,遵循空间实践塑造的标准化“行动情境”样板采取学术行动,选择“依附性自主”作为最优行动方案。在整体顺从的行动取向下,高校青年教师以“适应性拼凑”为策略寻找可能的抵制空间,通过审时度势的行动策略、共时平衡的行动态度和强语增权的行动目标,动态调整主体行动。

关键词: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空间实践;主体性行动;学术身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4012011

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校教职市场容量趋于饱和,高校青年教师就业情况出现结构性供需矛盾。学术锦标赛式的职称晋升聘任制度又进一步促使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劳动“内卷”的常态化^[1],导致青年教师的学术

修回日期:20251217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竞速游戏’: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身份建构的时间病理及行动逻辑——基于社会加速理论的个案研究”(2312207)

作者简介:郝薇薇,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引用格式:郝薇薇.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空间困境及主体行动[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4):120130.

Citation format:Hao Weiwei. Spatial dilemmas and subjective agency of young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4): 120130.

身份定位逐渐从“学术精英”转变为“学术打工人”，并贴上“青椒”式的自嘲标签。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反映了个体职业发展的现实境遇，是个体学术身份再生产的过程。在空间实践上，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的边界逐渐模糊，面临科研、教学、行政管理等多维时空翻转，学术空间再生产日渐匮乏。同时，受学术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高校的空间属性从“追求高深知识的大学组织”转向“商业化的科研公司”^[2]。在绩效导向的评价理念下，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工作空间始终处于“不确定的动荡”中，未达绩效目标的高校青年教师将会离开岗位，成功留岗的青年教师也并非高枕无忧，仍需接受动态变化的职称考核^[3]。在空间的关系场景中，高校青年教师作为社会空间的新成员，受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制约，学术方位感迷失。

高校青年教师的空间实践发生在日常学术生活中，借助主体性构想的空间表象和主体性体验的表征性空间共同组成空间关系场景，推动其学术身份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基于此，本文从列斐伏尔（Lefevre）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出发，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多维审视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阐释学术身份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探究学术行动的主体性策略。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一）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与空间实践

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与空间实践密切相关，推动个体主观建构学术身份进行日常学术活动。从外部空间环境来看，特定的外部条件是影响高校教师学术生涯的重要因素^[4]，学术职业的身份认同困境也更多指向外部的学术管理制度^[5]。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赋予时间为稀缺商品的特性，新公共管理主义强化了时间的紧迫性，高绩效、高竞争性的效率原则要求高校和教师用最小的时间投入换取最多的成果产出。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工作的物理空间正被赋予全新的空间句法，从“追求高深知识”转向“商业化生产”，并遵循市场逻辑以量化价值和外在贡献为空间表征^[2]。当市场调节作用对个体所处的空间环境影响程度较高时，个体更倾向通过提高自我能力以争取成为竞争场上的优胜者。因此，作为学术产出反映经济价值的原动力，市场力量迫使高校青年教师在内部身份认同与外部市场期待之间挣扎，他们尝试通过拓展工作空间或者改变工作地点等方式进行抵抗^[6]。

转向高校空间内部，阎光才等认为行政逻辑全面侵入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工作。随着聘任制度从常态的“编制岗位”转向非常态的“非升即走”式雇佣，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工作的空间地点由单一组织的固定归属走向多组织间的高频流动^[7]。同时，行政环境的干扰不仅导致高校青年教师学术方位感迷失，还改变了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工作的优先层级和嵌套关系^[6]。伊利约基（Ylijoki）等认为高职称的高校教师会利用权力优势将行政事务交给刚入职的青年教师^[8]，尽管高校青年教师处于社会空间的不利位置，但竞速逻辑也迫使他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信任缺失状态，难以摆脱对他者的观察与暗中比较^[9]。聚焦到高校青年教师的主体行动上，他们试图通过亲历性的空间实践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并通过与周围的主体积极互动生成空间关系场景。一方面，教学、科研与家庭的时空翻转使高校青年教师游离于学术发展之外，掣肘着自我的学术定位。高校青年教师长期生活在科研、教学、行政管理等多维任务转换中，易出现“角色挤压、角色分工性别化、角色紧张”等情况^[10]。另一方面，学术话语权和人际网络关系在高校空间场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1]。高校青年教师作为高校学术系统的初阶入职者，缺少参与决策的学术话语权，处于学术精英关系圈层的最外侧。这种相对弱势的空间位置导致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资源受限，阻力重重。为摆脱资源困境，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选择对已有制度进行普遍性顺从^[1]，其学术身份也逐渐由“知识精英”转变为“学术民工”^[12]。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多从制度层面考察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未能对高校青年教师这一群体

加以情境式分析,宏观阐述有余而微观聚焦不足;更多偏重对该群体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困境的事实描述,较少关注他们与空间互动过程中学术身份再生产的深层逻辑,对高校青年教师抵制行动的主体性也缺少积极探索^[13]。基于此,本文突破以往研究从时间或制度等单一维度讨论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现实表象的限制,借助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多维探讨高校青年教师是如何在日常学术生活中进行空间实践并影响其学术身份再生产的。

(二)理论视角

1. 空间概念

20 世纪下半叶,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提出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透视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由此,空间不再是抽象容器或地理区隔,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内含着形式、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概念。空间社会学最大程度地拓展了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包括物理性、社会性、情感性等特性^{[14]1-5}。社会中的个体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关系建构和行动实践形成社会空间,同时观念层面的精神空间控制着客观化的物理空间,形成空间关系上的一种权力控制秩序。列斐伏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将空间生产理论作为本体论的元哲学基础,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视角分析空间存在的社会关系实质,聚焦日常生活中规律性活动对物理空间赋予的新意义。空间再生产是以空间实践的物理空间为前提,借助主体性构想的空間表象、主体亲历的表征性空间,共同呈现一种全新的空间关系场景结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该空间关系的场景包括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3 个维度,并以此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问题^{[14]12}。

2. 空间概念对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适用性

任何一种学术活动都具有空间生产特征,生成于空间并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约束。所以,具备恰当的空间概念是理解学术活动的前提,空间特性能够为准确探究学术活动提供助力。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看待社会问题的宏观视角,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活动更加贴近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行动的关切^{[14]48};另一方面,空间实践并非物理性建筑的堆砌,还包含了高校青年教师社会关系的总和。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和生产,也生产社会关系。在现代性的空间约束下,新管理主义价值取向的职称晋升聘任制度不仅形塑着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空间实践的多维样态,也推动着学术劳动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14]48-49}。

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不仅需要空间的容纳,更需要通过空间透视,为思考其学术身份的空间生产提供多维分析视角的同时,发掘个体潜在的主体性力量。为此,本文立足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阐释不同空间交互作用中青年教师学术身份的再生产逻辑及其主体性行动路线,从而为高校助力青年教师的学术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引。

三、高校青年教师亲历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

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并存的时代,所经历和感觉到的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由实践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15]。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作为一种空间在场的学术实践,既是一种客观实体化的物理空间,具有高校组织的空间依附属性;又是一种精神空间,是新管理主义理念、竞争性筛选制度的价值投射,表现为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市场化发展而构想的空間表象;还是一种社会空间,是个体在亲历体验中与自我和他者生成的关系场景,呈现为推动关系发生的表征性空间。随着时空协同的质态变革不断涌现,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流转于实践的空间、主体性构想的空間表象和主体性体验的表征性空间三重空间之中。

(一)空间的实践:物理空间“单位人”身份的消散

空间的实践作为空间生产的前提,是高校青年教师日常学术生活直接接触的物理空间,并通过社会赋型(formation sociale)为空间属性赋予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14]51}。作为高校青年教师职业栖居的物理空间,高校在我国依附于国家的公权力系统,自带事业单位的空间属性,呈现强稳定性、高单一化的空间特征,具有较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高校事业单位的空间属性被打破重建,高校青年教师与物理空间的生产关系从拥有稳定身份和合法权利的高度依附转向以“契约”为纽带的合同式学术雇佣,“单位人”的身份形态遭受严重冲击。

高校“单位制”空间属性对单位人身份形态的冲击,催生高校青年教师生存型的职业心理图式,易致其陷入过度工作的空间体验,即随着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栖居空间由长期性单位制形态转向暂时性聚合地点,岗位调动重置的风险不断提高,以及个体与组织的空间关系也不再是从一而终的终身制联结,新一代学术职业群体被迫转换单位人身份、调整职业心理图式。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愈发认识到高校不再是他们心无旁骛地进行学术研究的“避风港”,以获得稳定教职为首要条件的生存型职业行动和心理图式成为他们首先考量的维度。出于生存需求的激励作用,他们往往以向内用力的方式模糊工作空间和私域空间的边界,频繁地将公域空间的学术任务和状态置于私人生活,甚至部分高校青年教师在下班后仍然在不停歇地查阅文献、撰写论文。这些高校青年教师过度的工作体验易造成过劳焦虑,进而对其学术身份产生自厌^[9]。

“委托—代理”式学术契约关系对标“完全教师”的身份,要求高校青年教师的行动空间受不同任务情境支配,身份定位“因境而变”。高校通过给予高校青年教师较高的薪酬激励,以合同的形式要求青年教师在既定时间内达到晋升标准,形成“委托—代理”式学术契约关系。这种学术雇佣的聘任制关系有着明确的责任条款和履约期限,强调组织中的学术个体需按照聘任要求在约定期限内给予绩效回报,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绩效水平。高校作为一个理性组织,要求青年教师在学术职业发展的初期就要成为一名完全教师(the complete faculty member),高效高质地同时完成教学、行政、科研等多线工作^[16]。因此,高校以及院系将聘任条款与青年教师的行动空间等值对应,青年教师受限于教学、科研、行政等不同行动情境的支配,身份定位呈现“因境而变”的特点。当青年教师的行动空间被迫受限于多维任务的时空翻转时,角色的频繁转换导致的不确定性和瞬时性威胁着学术身份的自我肯定。同时,任务支配的行动空间割裂了学术身份建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导致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身份认同的内在消解。

(二)空间的表象:精神空间“经济人”身份的偏轨

空间的表象是先导性观念构想(蓝图)建构的精神空间^{[14]51},通过语言、文字、图画等符号意象代表制度、文化和理念的内在构序形成隐性的空间权力,进而规范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价值观逐渐融入大学场域,新管理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理念相互博弈,形塑着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空间表征。借助竞争性的职称晋升聘任制度,空间表象在台前表现为绩效指标物相化的平等选拔,背后却影射着剩余价值的盘剥和隐性的奴役关系。职称晋升聘任制度的强竞争性将高校青年教师假设为经济人,以各种刚性的绩效指标作为“内化了的的外部要求”融入日常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中。高校青年教师更像是专门负责知识生产的“科研公司职员”,过度强调他们适用于高校外部竞争的外显性功能,忽视了个体学术发展的内在诉求^[17]。

学术管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强制性的构想功能,诱使高校青年教师的行为和心理图式出现经济人身份偏轨,产生策略性计算的逐利动机。学术管理本位主义的强制性构想继承了官僚结构和组织程序,处于学术层级底层的高校青年教师缺少充足的话语权。高校借助目标管理、绩效评估、

行政制度等标准规定强制操纵着空间的权力秩序,是真正具有设计、规划空间表象权力的统治者。高校青年教师仅能顺从已制定的理念框架,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这也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者活动中的自主性构序已经属于统治者的观点^[18]。新管理主义优先关注个人能够为集体组织提供多大的绩效贡献,并以此为逻辑强制性地形成绩效排名捆绑学术成果的“奴役”场景。作为学术劳动者的高校青年教师被打上制度烙印,学术行动被管理规范的空间表象高度裹挟,学术职业心理图式受到挑战,行为动机转向以外部功利性取向控制为主。此时,高校青年教师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学术职业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理性地计算利弊以选择更有助于自己职称晋升的短期行为,以追求“短期、高产”的快餐式成果来替代创造性的学术自主活动,进而带来他们的学术职业认同感日渐式微。

空间表象的强制性构序表现为无形的空间规训,竞争性聘任制度被合理内化为绩效导向的内卷式学术劳动,而不稳定的成果预期则进一步加剧了制度性焦虑。高校对所雇佣的学术劳动者——青年教师的管理优先遵循绩效考核、量化排名的逻辑,核心空间规则是商品,将市场经济中劳动交换关系等价量化产出。因此,职称晋升的聘任制度以实现高校目标为导向,将组织发展的硬性指标(一般包括省部级课题数量、高水平论文数量等)以各种刚性的绩效指标合理转嫁给青年教师,并要求他们必须在“你死我活”的学术竞争中优先出线。然而,制度市场化和考核指标化拔高了期刊核心化、基金级别化的难度,催生了高校青年教师不稳定的成果预期。期刊发展“核心化”对高校青年教师产生“挤压效应”,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期刊数量和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比例低至1:3257,基金级别化规定以省部级以上基金作为考核达标基准线,但省部级基金每年的审批数量极为有限。空间构想正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和理念灌输以压力传导的方式激发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空间的投入与成果数量的增长,形塑着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内卷式学术劳动的行动实践。然而,过度内卷的学术劳动会影响高校青年教师对学术职业意义理解的错位,他们虽然意识到过度内卷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但又不得不接受这种状态,并将其视为实现职业目标和保持排名的必要手段^[19]。

(三)表征的空间:社会空间“社会人”身份的彷徨

表征的空间是高校青年教师各类社会关系的再现,也是亲身体验周围世界的社会空间。随着职称晋升评价主体的多元化,高校青年教师需要在反复认知生成、情感互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建构主体依存性的关系场景。他们通过与不同群体交往来获得群体身份,实现群体认同,呈现“社会人”的身份印象。在这一过程中,高校青年教师日常学术生活的亲历体验表征为主体性遮蔽和交往性弱化。主体性遮蔽表征为个体陷入主流逻辑认同的困惑,徘徊于教师角色矛盾的泥沼中;交往性弱化体现为人际场域学术仪式链的普遍性“缺场”,具体情景中面对面的交往转向抽象、分离的形式化交往,学术职业的共同体精神日渐消弭。

任务导向的实践体验覆盖了结构松散的学术生活,自我主体性在精细安排的规训下被无意识地遮蔽,丧失了主体性的内在关怀。高校青年教师被嵌套于更高层级面向公共的行政逻辑,制度化的时间规定和确定性的精细计划规范着自主空间的支配限度,更使得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要符合规训的期望^[20]。集体劳动空间控制的管理模式通过制度规定分解任务层层管治,教学工作被赋予优先权,它是严格按照学年学期学周等教学任务要求具体到确定的空间;管理工作被赋予相对的优先权,受行政力量的影响通常优先于科研活动。任务导向的空间控制力量与高校青年教师的日常劳动量等值对应,他们严格受控于各项任务按期完成的绩效目标,学术工作紧密地安排着每一寸自主空间。这种看似高效、经济的空间体验让高校青年教师产生了自我价值最大化的认知错觉,他们逐渐认可并顺从于制度规定,以组织目标为导向安排自主空间。在外部空间的规范下,具象化的时间投入回报比遮蔽了本真的自我体验,牺牲了高校青年教师角色的内在权力,模糊了个体对学

者身份的认知边界,使之成为听从安排的打工人,忽视了知识生产的自主创造性。

人际场域的关系场景隐藏着真实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学术网络中隐秘性的学术话语权和竞争性的同行关系确认空间位置,并形成工厂式的他者交往关系。社会空间中的交叉关系本质上是工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演化成的资本等级,能否在他者交往中取得预期收益成为刺激交往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就高校青年教师而言,学术工作中共事主体的相对社会地位、学术权力水平是其确认空间位置的关键因素。学术话语权表现为隐秘的权力关系,具有高影响力的“帽子”人才是关系网络的轴心。关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需求的职称评审由专业领域的资深前辈主导,而他们在看待问题时优先站在主流学术立场而非“自我立场”,以谋求更高的职业声望和学术地位。同辈同行间的交往表现为不信任的竞争关系,高校青年教师奉行自我保全的原则,出于对落后的恐惧,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潜在竞争对手的学术行动。由于学术锦标赛遵循“你死我活”的竞争逻辑,高校青年教师避免“敞开心扉”地讨论学术成果,致力于形成一种工厂式的空间生产关系。这种关系以短、平、快的资源交换作为交往的前提条件,他们不再是志同道合的同行者而是利益置换的交易者^[21]。

四、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空间实践的主体行动

处于变革中的制度对象绝非机械的制度接纳者,相反他们是“具有独特且固定偏好”的行动者^[22]。受个体利益结构与资源特征的调节作用,已有研究将高校青年教师划分为谋求生存的权宜者、求生存后发展的变通者、生存发展兼顾的协调者和能力超群的悬浮者等不同类型^[1]。然而,作为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首要满足的先决条件,以稳定教职为标志的生存需求迫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卷入达标竞赛中,空间实践也由此塑造出标准化的行动情境,个体行动优先遵循“依附性自主”式行动模板——由审时度势的策略、共时平衡的态度、强语增权的目标三者叠加而成。依附性是高校青年教师与组织空间的主要关系,主动顺从于空间表象的强制构想;自主性是高校青年教师主动尝试以最理想化的主体行动与外部空间的刚性约束进行协商、博弈的自我意识,以谋求在空间生产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一)“审时度势”的行动策略:合理配置空间布局

高校青年教师从主体出发在日常学术生活中进行空间实践,积极转变单位人身份心态,顺势而为地最大化利用有限空间。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行政逻辑和绩效排名共同影响高校青年教师学术成果的达标评价,以最终成果产出的达标情况作为考核标准,既不限学术工作的物理空间,也不考核学术成果的完成过程。同时,学术管理本位主义以目标管理为取向,尚未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行政、科研等多线任务的达标过程加以限制。这就极大地延展了物理空间的功能多用性,让高校青年教师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有限的物理空间赋予多重空间表象。

高校青年教师充分利用弹性兼容的学术空间,自主安排学术工作进度,专注创造性学术研究。一方面,自主调配学术工作场地,合理调整工作与生活的空间边界。从正常的学习进程来看,高校青年教师获取博士学位的年龄普遍在28岁左右,博士后普遍在30岁以上,教育年限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该群体家庭生命周期的起点^[23],即刚工作就面临结婚、生子、购房等现实问题。面对生活的经济压力,高校青年教师通常以较高的自我内驱力高效利用工作空间,通过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来提高学术产出效率,追求职称晋升的价值回报。同时,面对过劳的工作体验,他们也尝试以学术暂停、更换工作岗位等方式暂时性逃离,以缓解精神耗竭。另一方面,主动整合空间角色,因势利导地实现资源赋能。面对多线程任务的行动空间,高校青年教师主动根据现实情况合理规划各项工作任务,平衡知识创造性学术工作和行政管理性日常工作。同时,高校青年教师也尝试采取“拓展—整合—赋能”的发展策略,推动不同角色空间资源的互联互通。对于高校规定的行政管理、课堂教学等非学术性工作,

一些高校青年教师主动改变对行政辅助工作的刻板思维,借助扮演“隐性”行政工作者的便利,更加敏锐地感知组织的规划布局,快速融入学科团队和组织平台。

(二)“共时平衡”的行动态度:兼顾学术信仰和现实发展

高校青年教师通过自主构想的空间表象对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进行再编码,以“共时平衡”的行动态度坚守学术精神的自我尺度,并在学术劳动中赋予自我身份“蓝图”式的学术期望。高校青年教师在顺从行政逻辑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个体主动赋能空间表象的能动作用,对持续变动的绩效考核进行慎重判断、选择和行动。面对职称晋升聘任制度隐含的剥削关系,高校青年教师努力结合学术理想与现实考核,更加灵活地将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内容整合进外部资助的横向课题中,从而兼顾学术发展与绩效考核要求。

高校青年教师在有限的学术空间中努力将学术精英的理想形象现实化,以积极主动的学术态度化“被动学术”为“主动学术”。一方面,主动对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赋予空间表象,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身份进行创造性学术劳动。高校青年教师在进入具体的入职工作地点前,会对高校产生一种表象性的“设想”,即高校等同于学术空间。对职业发展抱有高回报性、高价值性的身份期待,他们秉持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心态,精心计算学术考核标准,刻意钻研绩效达标的制度漏洞,同时又始终坚守对学者身份的职业追求,不放弃尝试产出有价值的高质量成果。高校青年教师虽然处于学术金字塔的不利地位,但仍对长时间学习的知识储备和发展前景抱以积极态度,更倾向选择更换工作岗位、选择更适合的高校等主动策略。另一方面,他们努力避免制度规训的无效化学术劳动内卷,主动将保质保量作为学术产出的优先标准。为提高竞争力,高校管理者实行效率最大化的企业化管理模式,采用目标管理、绩效评估、节点考核等制度,严格规定高校青年教师的目标任务。面对学术内卷化的日益加剧,高校青年教师主动拒绝成为平庸的信息生产者,以隐藏的、不易被察觉的自我约束和自主管理为内在逻辑,试图在质量和数量间谋求平衡。同时,高校青年教师也将策略性暂离作为自我保护和职业发展的有效策略,尝试通过减少学术产出、转向教学或行政职务,甚至选择短期或长期的学术休假来寻求心理平衡和职业满足。隐性的自我控制力量隐藏在从外部施加、与绩效直接挂钩的显性制度规范之中,对高质量学术成果的追求彰显了高校青年教师对“学术精英”身份的自我坚守。

(三)“强语增权”的行动目标:突显社会空间网络位置

高校青年教师以“强语增权”为目标指引,以学术创新为行动原则,在主体性体验的表征空间中与不同人员互动,形成关系依存性场景。从观念构式空间直接转换为主体亲历的体验空间,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不仅是精神的理性辨识,也包含着关系交往的复杂感性情境。身份定位与空间位置之间的绑定关系要求高校青年教师以学术为核心,不断扩展并融入日常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

高校青年教师觉醒自我主体性,主动构建交往共同体,增强学术话语权。在社会空间中,认可机制是高校青年教师确定自身在学术网络中具体位置的关键,其学术工作主要以获得更广范围、更程度的认可为核心加以展开。相较于“非升即走”式的制度性认可,学术共同体间的主观性评价(如高水平学术会议分享、研究方法创新等)与客观同行评价(包括期刊发表的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更为关键。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不断加强自我反思,充分发挥学术创新优势。社会风险理论认为,需要以批判的视角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以保持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24]。高校青年教师的个体行动并非如制度设计预想的那样,能始终遵守制度的初衷,始终保持对外部空间的理性反思,并根据精细化管理的节点设置做好自我规范。他们以学术创新为指引,通过主动参与国家战略导向的前沿课题、为研发关键技术贡献力量等方式,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通过创建交往共同区,扮

演知识创造者角色。出于积累社会资源的考量,高校青年教师往往会通过主动建立交往共同区,寻找学术会议、科研合作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以共同的空间体验为基础促成交往信任。在空间实践过程中,高校青年教师努力重构与他人交往的学术仪式链,以知识创造者的角色主动分享研究成果,不断将学术资源转化为学术产出成果。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1. 学术身份的空间生产逻辑

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遵循空间生产逻辑实现学术身份的再生产,学术生活的实践空间、主体性构想的空間表象和主体性体验的表征性空间共同组成空间关系场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以客观实体的组织空间为存在前提,通过个体感知对单位人的附属空间属性进行解构。组织空间中既有的价值取向赋予其型构性的空间表象,制度变革的合法性逐渐适用于内在规范、心理图式和个体行为等一套被广为接受的价值体系^[25],以层层传导的方式合理转嫁给高校青年教师。在外部空间的刚性约束下,高校青年教师遵循“经济人”的理性计算逻辑,陷入无止境的学术劳动内卷之中。同时,他们也试图借助个体精神世界的观念构式,自我遮蔽似地掩盖现实空间中的学术伪镜。高校青年教师在追求主流绩效导向的过程中逐渐陷入“社会人”的身份彷徨,自我主体性在精细安排的规训下被无意识遮蔽,与他者的交往呈现为一种工厂式的互动关系(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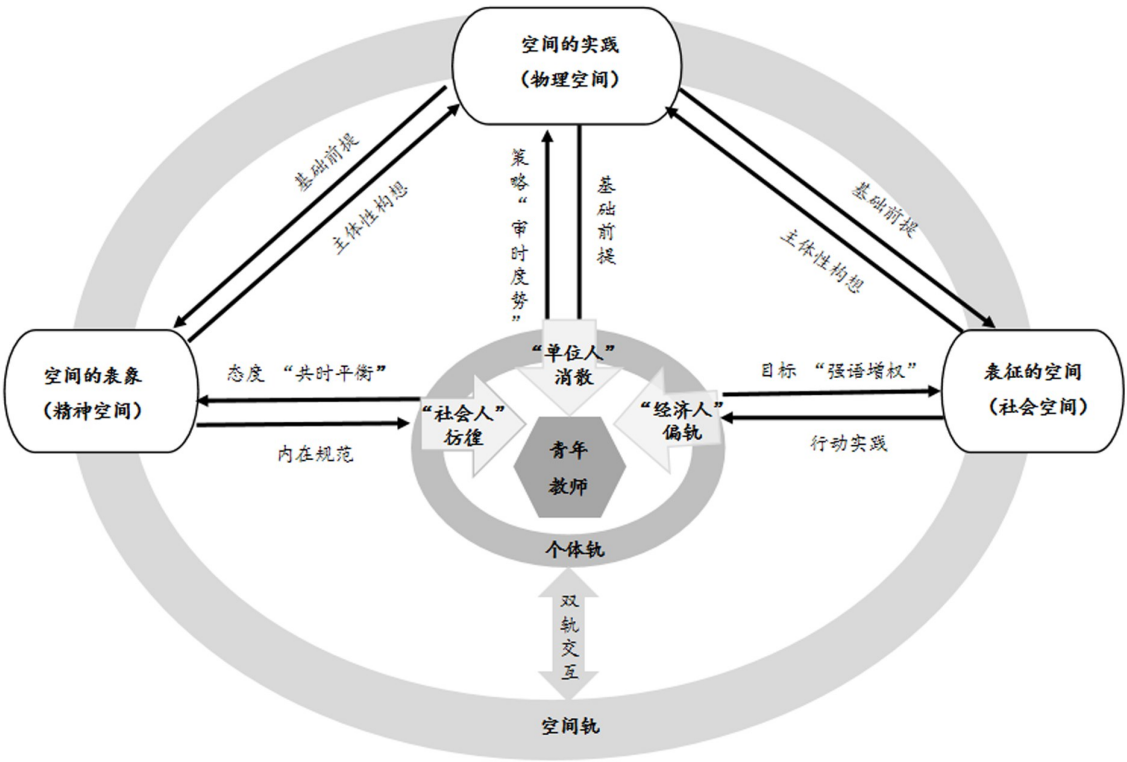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身份的空间生产逻辑及主体行动

在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身份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三重空间的作用路线按照“个体—空间双轨”的运行逻辑交互影响。一方面是空间对个人的正向作用。三重空间之间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学术身份的空间生产。物理空间组织属性的内聚是空间生产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也是高校青年教师进行学术生活的客观空间,为学术身份的空间生产奠定了基石;精神空间承载的筛选理念、评价制度、价值取

向等符号意象是空间生产的内在规范,在层层传导过程中将一套合法的意义框架和符号表征嵌入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活,支撑起学术身份的完整塑造;在社会空间中,相关主体的分离与融合衍生出的各种关系是空间生产的行动实践,高校青年教师以亲身体验串联起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并在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生成主体性关系场景。另一方面是个体对空间关系的反向作用。个体行动会反向推动旧空间向新空间迭代升级。高校青年教师受当前空间约束而作出的个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未来新的空间实践提供了反思和借鉴。高校青年教师是具备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适应性拼凑不同的空间元素,生成具有制度合法性的学术身份,并以此为基点推动集体空间发展。处于核心层的学术身份能够发挥塑造个体认知、指导行动的作用,反向推动集体空间进行目标设定、规划制定、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同时,经由空间实践再生产的学术身份,维系高校作为组织空间的相对优势,并以此提高高校的排名和地位。然而,一些高校青年教师在终日饱受淘汰的压力下精神极度紧张,甚至出现“自杀”“跳楼”等极端行为。这种学者身份的消解背离了空间设计者期待提高组织绩效的初衷,空间表象由此重塑,制度安排、价值理念等符号意象被再次重构。

2. 依附性自主的主体行动原则

当前行政化的制度将高校青年教师的空间实践塑造成标准样板,规定了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行动的最优解,高校青年教师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遵循“依附性自主”式的规范模板主动地顺从空间规训。面向集体的评聘制度改革,以压倒性的制度优势对个体动机与行动取向产生影响^[26],左右着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行动——选择“活命”抑或“使命”?高校青年教师被置于高流动风险的物理空间,学术行动难以有效弥合生存与理想,行为策略和职业心理图式遭受冲击。除行动表现上的标准化规范以外,模板化的空间实践也控制着高校青年教师的内在灵魂——他们自觉地从获得“聘任制改革所释放的价值效益”的内在动机出发重塑工作习性,优先选择采取何种行动脱颖而出以实现学术抱负的行动路线,而非抵抗外部空间约束。

由于空间资源的依赖性,鲜有高校青年教师能够完全逃离空间的外部约束,他们在整体顺从的行动取向 downward 寻找抵制空间,通过审时度势的行动策略、共时平衡的行动态度和强语增权的行动目标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处在“非升即走”阶段的高校青年教师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稳定教职的生存需求,以计算化逐利思维驱动行动回应职称晋升评价制度。但是,作为新一代的学术职业者,他们仍然怀抱着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没有完全脱离生存需求,也没有被生存需求彻底捆绑,而是追求生存需求和学术理想共生的主观诉求。在依附式自主的空间实践原则指导下,高校青年教师试图调动不同空间元素,以灵活、机动地组合现有空间资源开展即时性实践行动,适应性地突破复杂情境的空间约束。更有甚者,他们敢于利用“弱者的武器”直接挑战制度^[27],抑或以彻底逃离学术圈的方式长期逃脱原有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高校青年教师不断地重构学术身份,动态地调整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体空间对个体自主性发展的约束作用。

(二) 研究建议

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空间实践始终内嵌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因此,完善学术发展支持的宏观机制尤为重要,亟须预留制度空间,让高校青年教师在积极建构学术职业身份之余加以必要调适,避免外部空间的刚性约束对高校青年教师的主体性造成侵蚀甚至是抹杀。

首先,合理配置学术资源。受控于行政逻辑的强制性安排,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空间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因此,政府和高校要有效调控资源靶向流动,以精准思维设立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发展专项基金、专项人才计划等,让更多的资源流向高校青年教师。

其次,优化人才聘用制度。设置相对开放的聘用周期,动态调整人才聘用政策中刚性的年龄限

制,坚持阶段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以质取胜,灵活调节“非升即走”的制度期限,推动高校青年教师从追求岗位稳定的组织忠诚转向重视学术发展的职业忠诚。此外,职称晋升评价还要将辅导员、班主任、教学等多元工作经历纳入考核指标。

最后,健全学术指导服务体系。依托多元化平台资源,资助高校青年教师参与研修访学,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全方位托底人才发展。同时,采用以老带新的学术导师制,为高校青年教师提供资深带教导师,促进高校青年教师社会化。政府和高校也要重点关注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住房、工资待遇、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为其创造安心从事教学科研的空间环境,帮助其更好地平衡工作学术与生活。

参考文献:

- [1] 任可欣,余秀兰.生存抑或发展:高校评聘制度改革背景下青年教师的学术行动选择[J].中国青年研究,2021(8):5866,102.
- [2] 牛风蕊.高校教师评价制度的改革困境及其张力[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4):5260.
- [3] 刘珈彤,朱晓文,李玉磊.制度、平台与人际关系:高校“青椒”职场生活质量核心要素的质性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3):110119.
- [4]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3.
- [5] 项飙.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76.
- [6] 韩双森,谢静.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学术身份构建过程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2(4):7477.
- [7] 阎光才.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J].教育研究,2021,42(8):92103.
- [8] Oili-Helena Y, Hans M. Conflicting time perspectives in academic work[J]. Time & Society,2003,12(1):5578.
- [9] 李雨潜.困在时间里的人: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焦虑感的现状、产生及缓解[J].江苏高教,2025(1):4250.
- [10] 李琳琳.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1):107119,190.
- [11] 干婷,罗生全.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发展:现实困局、关键要素与支持机制[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1,4(2):9299.
- [12] 王玉玲.高校青年教师的“内卷”困境与对策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4(3):512,26.
- [13] 葛晖.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建构的动态性考察[J].当代教育科学,2017(10):2731.
- [14]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5] 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9.
- [16] Fairweather J S. The mythologies of faculty produ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2,73(1):2648.
- [17] 沈红,刘盛.大学教师评价制度的物化逻辑及其二重性[J].教育研究,2016,37(3):4655.
- [18] 广松涉,彭曦.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0.
- [19] 莫桑梓.扎根理论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内卷化及破卷研究[J/OL].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423[2025-14-29].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978.G4.20250325.1031.002>.
- [20]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8.
- [21] 李雨潜.“青焦”的诞生: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焦虑感研究[J].江苏高教,2023(9):96103.
- [22] 张伟,张茂聪.聘任制语境下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职业困境与制度变革路径——新制度主义视角[J].高校教育管理,2020,14(4):5260.
- [23] 王小璐.从解析“剩女”到建立婚姻角色过渡的分析框架[J].中国青年研究,2010(5):59.
- [24] 时广军.高校青年教师的角色冲突:社会风险论视角[J].江苏高教,2017(9):5458.
- [25] Hall P A,Taylor C 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J]. Political Studies,1996,44(5):936957.
- [26] 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3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1.
- [27] Gina A. Mapping academic resistance in the managerial university[J]. Organization,2008,15(2):254270.

(责任编辑: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张海生)

Spatial Dilemmas and Subjective Agency of Young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

Hao Weiwei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an era of global competition, young faculty of higher education face multiple obstac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academic careers. Lefebvre’s trialectics of space provides a structu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s of individuals’ academic career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daily academic life of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shifts across three interconnected spaces: the lived space of practice, the perceived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onceived space of signification,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relational context of spatial interactions. In the lived space of practice, the long-standing highl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al bond i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into a principal-agent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 of the work-unit system within organizational space is fading, which undermines teachers’ identity as danwei people (affiliated employees of a work unit). In the perceived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the coercive spatial framework imposed by academic managerialism has been interiorized by individual academics, leading to involution in scholarly pursuits and a distorted identity as the economic man. In the conceived space of signification, task-orien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overrides loosely structured academic spheres. Individuals’ subjectivity is obscured by meticulous administrative scheduling, which erod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peers and plunges them into the identity confusion of being a social man. When it comes to individual agency, driven by survival needs, young faculty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drawn into benchmark competitions to varying degrees. They adopt academic practices following standardized behavioral scripts shaped by spatial realities and opt for dependent autonomy as their optimal course of action. Under the overall compliance mindset, these faculty seek potential room for resistance through adaptive scrambling. They dynamically calibrate their behavioral strategies by sizing up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maintaining a balanced pragmatic stance, and setting empowerment-oriented developmental goals.

Key words: young faculty of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life; spatial practice; subjective agency; academic identity